

加缪《鼠疫》中的悲剧意识

赵秀红

(上海师范大学 欧洲文化与商务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 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以其寓意深刻的“哲理小说”而得到世人的瞩目。纵观以往的评论,人们大都只注重对其文本的哲理批评,却忽略了作品中浓厚的悲剧意识。实际上,“悲剧意识”是贯穿加缪小说创作的主旋律,它蕴藏在作品深处,它的产生与作家的生活、所处时代及其所接受的哲学思想是密不可分的。这三个方面能够令人触摸到加缪的“悲剧灵魂”。

关键词: 悲剧意识;《鼠疫》;加缪

在大多数读者眼中,《鼠疫》是阿尔贝·加缪小说中最“阳光”、最鼓舞人心的一部,因为它体现了一种“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曾有人评论说:“加缪一扫以往作品中的悲观气氛,在这里奉献给读者的是一个正视现实、不畏艰难、忘我献身、以实际行动与恶势力抗争的存在主义的英雄。……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人道主义的光芒。”^[1](P116-117)]然而,对此观点,笔者不甚赞同。笔者在小说中体味更多的是充溢于字里行间、隐藏在主人公反抗背后的汨汨“悲之情”。以至于萨特曾这样评价加缪独特的写作风格:“谈到他的悲观主义,我认为他热爱阳光,但同时又想到太阳中有黑子。”^[2](P86)]《鼠疫》发表于1947年,描写的是在阿尔及利亚海滨小城奥兰发生了鼠疫,以里厄医生为代表的岛内居民不畏艰险,与疾病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鼠疫退却了,然而尽管喧天的锣鼓冲淡了人们对疾病的恐惧,可是奥兰人永远不会忘记鼠疫曾给他们带来的梦魇。作品中,加缪不惜大量笔墨描写了奥兰人饱受离别与死亡之苦。《鼠疫》以其出色的写实充分地展

示了加缪的悲剧情愫,是作家悲剧创作的精华之作,更是作家心灵之“悲”的体现。这份源于作家心灵的沉重与感伤意义深远,它暗含作家身世的不幸,紧系制造悲剧的时代,同时又与作家所受的哲学熏陶密切相关。笔者从这三点出发,结合对《鼠疫》的分析,探寻作家悲剧情结的源头。

一、悲剧创作彰显悲剧人生

很少有人会把加缪的身世与其作品的思想及创作风格联系起来。然而,在笔者看来,加缪复杂的个人经历其实蕴含着许多悲剧因素,他本身就是个悲剧角色。1913年,加缪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父亲吕西安·加缪在一战爆发后,被应征入伍,不久,父亲因头部受重伤而死在医院里,使他“从来没有与那位素不相识的父亲哪怕是从理论上接近过”。父亲的去世不仅使不满周岁的加缪成了战争孤儿,更使全家因断绝经济来源而陷入穷困的境地。丧父的经历尽管没有被直接写入作品,但由此所积淀的悲剧心理却大量涌入他的创

收稿日期:2005-10-25

作者简介:赵秀红(1974-),女,满族,辽宁锦西人,上海师范大学欧洲文化与商务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法国文学研究。

作题材,父亲形象的缺席多次被反射到作品里。《局外人》和《鼠疫》的主人公(默尔索和里厄)都是对父亲避而不谈,《第一人》中主人公则是在不断地对父亲的存在进行追问。在加缪诸多的创作中,甚至找不到一本与描写父爱亲情有些许关联的作品。在传统的概念里,父亲代表着家和根基,他是支撑一个家庭的“上帝”,而年幼丧父无疑暗示着家之解体、根基的丧失。这是一种非正常的、失衡的状态,它使人游离于正常生活之外,并会引起人在精神上的焦虑和恐慌。父亲早亡的经历,或多或少影响着加缪的人格发展,为他悲剧创作基调的形成埋下种子。

另外,加缪的作品中存在着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那就是:女性形象是近乎缺失的。加缪的“女人们”不作思考、丧失独立行为,她们不具备人物的属性,充其量只是些界定男人思想和行动的标签。《局外人》中的玛丽是用来标明默尔索对外界态度的重要道具。《堕落》中的女人缺乏个性,她们隶属于克拉芒斯。而在《鼠疫》中,女人并不在场,她们在别处,只留下男人们独自抗争。这就是“不作思考的女人之声”。^{[31](P36)}从加缪的身世考证,这与他曾经共同生活过的三个女人不无关系。父亲去世后,母亲无法自食其力,只得带着孩子和加缪的外婆生活在一起。母亲生性木讷,寡言少语,不知如何疼爱孩子,而外婆却是个粗暴的女人,粗暴到有时甚至用皮鞭抽打孩子。这样的管教给加缪的童年记忆带来的仅是惶恐和忧伤。因此,“所谓的家”在加缪的眼里成了“一个贫穷,肮脏,令人厌恶的地方”。另一个女人就是他的结发之妻西蒙娜。西蒙娜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长相出众,一度是当地男人们追求的对象。加缪把她当作梦幻的实体,对她百般呵护。然而西蒙娜因病长期注射吗啡而染上了吸毒的恶习。为了获得毒品,她甚至去勾引年轻医生,加缪以为慢慢地能治愈她,可她恶习难改,并且服饰和行为也非常荒诞,被加缪的朋友说成是“从《恶之花》中走出来的女人”,加缪烦恼不堪,对西蒙娜越来越冷淡,最后只得结束这段只维持了18个月的婚姻。自此,加缪一再承受着失败婚姻带来的伤痛和孤独的冲击。与三个女人相处的不愉快经历,使他一度排斥女性。虽未到憎恶的程度,但演绎到作品里,读者看到的却是女性形象的缺失。

一般来说,女性代表着温情、爱与和平,她们

的存在会使世界充满生机和活力,因此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有无会直接影响作品的气氛,它给读者带来的感受也是截然不同的。在《鼠疫》这个属于男人的世界里,女人被描绘成“坠入深渊的人”。加缪除了轻描淡写地描述过里厄母亲那寡言少语、目光凝滞的模糊形象(其实这无疑就是加缪自己母亲的形象)之外,女人给读者的印象就只有活在男人们想象中的份儿了。里厄的妻子在封城前因疾病到外地去疗养,封城使他们天各一方,妻子还未等到解禁就客死他乡。处于热恋中的年轻记者朗贝尔因采访任务从巴黎来到奥兰,却意外地被鼠疫困在了城里。封城阻断了他的返乡,他使尽浑身解数想要逃出城与情人团聚。作品中,朗贝尔的情人并未出现,加缪只是用了大量笔墨描写朗贝尔的相思之苦。小人物格朗的妻子早已离他而去,但在他追忆早年共同生活的时光时,妻子仍会使他黯然神伤。当里厄偶然发现格朗为妻子流泪时,他从这个男人的哭泣中深深体会到“这个无爱的世界犹如一个死亡的世界”,而缺失女人的世界更无异于人间地狱。

与《鼠疫》相比,同属描写“瘟疫”的小说,吉奥诺的《屋顶上的轻骑兵》却不乏女人的形象:性格刚毅、救死扶伤的老嬷嬷;与男主角患难与共、并赋予其救人行动真正意义的波利娜(轻骑兵上校在旅途中无数次救人,但唯一救活的只有波利娜)。这两个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给整个作品带来了生机和亮色。尽管死亡气息从四面袭来,读者却无时无刻不被男女主人公乐观向上的精神所感染。在那里,女人是希望,是生的契机。她们的存在使整部小说沐浴在明朗轻快的气氛之中。这样的人物设置及其带来的效果,无疑也反映了作家面对灾难的乐观心境。而《鼠疫》中,女人形象的缺席,加剧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削弱了对生的渴望,带给读者更多的凝重和悲观情绪。

父亲的早亡、母亲的麻木、外婆的冷酷加之婚姻的破裂,这诸多不幸带给作家难以磨灭的心灵创伤,促使他在创作中执著于悲剧情结而不断赋予作品灰暗的色调。

二、悲剧创作回应悲剧时代

如果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那么加缪

的作品也不例外。他的悲剧创作风格紧系着悲剧的时代。

加缪一生先后经历了1913年和1939年两次世界大战,也目睹了发生在其出生地阿尔及利亚的血腥冲突。他是反专制作家中最投入的一位,是反对歧视北非穆斯林的先驱之一,也是反法西斯的西班牙流放者、斯大林大清洗的受害者、青年叛逆者、为理想拒服兵役者的支持者。尤其是在二战期间,他曾亲自参加了抵抗运动,担任地下报纸《战斗报》的编审工作,并在为各种地下刊物撰写文章的同时,组织编演了一些反映为自由而战的话剧,以鼓舞人民的斗志,呼吁法国人民起来共同抗击敌人。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投掷两颗原子弹,8月8日的《战斗报》这样评价道:“机械文明已达到了它野蛮的极点。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必须在集体自杀和科学成就的明智运用之间作出选择。”^{[3](P265)}接受了战争洗礼的人道主义作家加缪,在目睹了一幕幕人间惨剧的同时,也拿起笔来回应这个制造悲剧的时代。小说《鼠疫》就是回应那段苦难岁月的力作。作为抵抗运动的参加者和见证人,加缪试图通过隐喻的形式描述人们的战斗经历,刻画那些在战争中经历了思索、沉默和精神痛苦的人的形象。他说:“我试图通过鼠疫来表达我们所遭受的窒息以及我们所经历的受威胁和流放的环境。同时,我还想把这种表达推广到总的生存概念上。”^{[3](P267)}

《鼠疫》之“悲”着重体现在它的象征意义上。象征意义贯穿小说全篇,可分为广义、狭义两种。从广义上来看,受到疫情威胁时的奥兰人的心灵体验实则暗示着整个人类的生存处境,因为从人的生存这一更普遍的概念来看,“人是要死的,是死囚,只是不知道死期,人始终受到死亡命运的威胁,生活在一种焦虑的状态”。^{[3](P132)}从狭义上来说,鼠疫病菌是二战中德国法西斯的象征,奥兰城则是当时纳粹阴影下法国处境的写照,而城内人们与鼠疫进行的抗争,实则是20世纪40年代国际民主阵营与法国抵抗力量联手击溃法西斯的生动反映。诚然,小说无疑昂扬了一种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但仔细研读作品,读者不难发现其中暗含的悲观论调。在小说的结尾,作者借里厄医生之口,特别强调了胜利的暂时性: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

伏等候,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4](P477)}这样的悲观警示,令人深感震惊,并从胜利的欢愉气氛中重又跌回到绝望的境界。因为胜利是暂时的,“鼠疫”永远不会消失,它只是暂时离去,积蓄力量后,它定会卷土重来。

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象征,它们反映的都是作家对世界和人类荒诞命运的担忧和不安,都是在作家悲剧的创作风格中得以彰显,并最终体现“存在”这一沉重的主题。

三、上帝死了,人要活

加缪的作品以揭示人的荒诞生存困境为主旨,处处彰显着悲剧的精神。从默尔索的冷漠、厌世到里厄医生的绝望抗争,再到向荒诞撞击的卡里古拉,其人物或经历孤独、苦闷或体验恐惧、死亡,他们的行为体现了人对自身悲剧宿命的追问,更是“上帝死后”,人对冷漠世界的绝望抗争。纵观加缪的创作,确实存在着凝重的悲剧意识。这与他的哲人气质及所受的哲学熏陶不无关系。加缪酷爱哲学。在青年时代,尼采、克尔凯郭尔、柏格森、海德格尔等哲学家的著作就曾不同程度地滋养过他。其中,尼采是对加缪影响较大的一位。作为悲剧精神之集大成者,尼采的哲学始终贯穿着一股悲观主义的基调。他的一句“上帝死了”的呼声,震撼了整个西方,宣告了以基督教道德体系的欧洲传统文明的崩溃。加缪欣赏尼采对基督教的无情批判,钦佩其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他部分地汲取尼采悲剧思想的精华,将其融汇成自己的悲剧理论。

尼采认为“上帝已死”,加缪同样不信上帝的存在。《鼠疫》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沉默的、不公正的、残酷的“上帝”。沉默的“上帝”不理睬人们痛苦的呼喊,不体谅人们殷切的期盼,沉默的“上帝”漠视人们所遭遇的痛苦,任凭人们挣扎于劫难。作家用这样讽喻的手法对上帝的存在提出质疑。他认为:假使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存在,那么面对鼠疫,他定会挺身而出。可是,面对肆虐的疫情,上帝没有出现,反而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是人自己拯救了自己,因此人才是自己的救世主、自己的上帝。

尼采反对基督教的“永生”,加缪则否认宗教所鼓吹的“对来世的希望”。并且更强调人要勇敢地承受命运,接受生命的悲剧性,并反抗之。《鼠疫》中神甫在第一次布道中宣扬了宗教的“永生、来世和希望”：“很久以前,阿比西尼亚的教友们把鼠疫看作一种上天所赐的获得永生的有效方法。那些没有得病的人用鼠疫病人用过的被单裹在身上以求必死……这一事例至少也有它的教育意义:它使我们更有远见,能察觉到隐藏在痛苦深处的这道美妙的永生之光。这道光照亮了通向解脱的昏暗的道路。它显示了万无一失、能变恶为善的上天意志。”^{[4](P310)}其实,神甫的希望无非就是让“这个城市的人不要管这些日子的景象多么可怖,垂死者的悲号多么凄惨,都向上天发出虔诚教徒的心声,倾诉爱慕之情。其余的事,天主自会作出安排。”^{[4](P311)}然而,加缪首先意识到的却是人必死的命运,他不相信永生和来世,只相信生活虽可悲,但悲而不绝。他认为人要注重的是现实,要把握的是当下,要直面的是对痛苦的体验,要做的是对生活的积极参与,而不是仅仅躲在希望的虚妄中去做消极等待。本着这样的原则,里厄医生拒绝对上帝的信仰,一心只想着能够“尽我的职责”为抢救生命作最大的努力。尽管他也认识到人的努力永远将是“一连串没完没了的失败”,但他同样也认识到:“习惯于绝望的处境比绝望的处境本身还要糟”,于是他便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与鼠疫进行殊死搏斗,与奥兰人民共

同演绎了一曲现代西西弗斯的抗争悲歌。他的行为正是加缪的“人正视荒诞命运”的态度,即:人在没有上帝的依傍下,面对恶的世界,应该勇敢地承担自己的责任,通过不懈的筹划和操劳展示生命的价值,显示存在的意义,在与恶的绝望抗争中,勇往直前,虽九死犹未悔。它使人直面“大死”而“大活”,是一种“大勇者”的精神,它使人能够抹去自身沉沦的麻木,增添一丝自觉的“悲壮”色彩。就此,展现了加缪悲剧的另一层含义。

埃马纽埃尔·穆尼埃曾称赞加缪的作品表现的是“一种充满光明的阴郁哲学”。^{[2](P87)}笔者把加缪作品所体现的哲学内涵汇成一句话,那就是:“上帝死了,人要活。”这句话饱含着作家的人生体验,体现了他对人生和世界的态度,成为了贯穿其作品的主旨,同时也是他悲剧思想的精髓。没有“上帝”的世界是个荒诞、失衡、混乱的世界。然而,无论如何,人还是要坚强地活下去,并且要活出价值,活出意义。

参考文献:

- [1] 杨芬. 一个存在主义的英雄[J]. 法国研究,1999.
- [2] 罗歇·格勒尼埃. 阳光与阴影[M]. 顾嘉琛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 [3] 张容. 形而上的反抗:加缪思想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 [4] 阿尔贝·加缪. 加缪文集[M]. 郭宏安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A Sense of Tragedy of Albert Camus' *Pestis*

ZHAO Xiuhong

(College of European Culture and Busines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The French writer Albert Camus is well known for his philosophic novel with profound implications. However, a survey of the previous comments show that most scholars only focus their critical comments on the philosophic principles of the text to the neglect of the strong sense of tragedy. Actually, as the theme in the novels of Camus, the sense of tragedy is conceived in the works. Its emergenc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ife, the age and the philosophic ideology of the writer.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novel *Pestis*, this paper makes one feel the sense of tragedy from the above three aspects.

Key words: a sense of tragedy, *Pestis*, Albert Camus

(责任编辑:吴晓明)